

编者按:

2006年,国家文物局与测绘局协调有关专家学者组成“长城保护工程——长城资源调查与研究”课题组,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课题的组织、实施。至2012年,课题组基本完成了预设的调查与科研任务。在6年的探赜求微中,课题组以“摸清长城家底”为目的,采用传统田野考古与现代测绘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境内全部长城遗存进行系统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宁夏、陕西、湖北、甘肃、新疆、青海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调查确认,我国境内现存长城遗存分属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明等朝代,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同时确认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墙体、壕堑、单体建筑、关堡及相关设施等遗存类型共计43721段(座/处)。此次长城资源调查获得较为翔实的长城基础资料,为长城保护、修缮、利用以及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这里遴选4篇优秀调查与研究文章以飨关心与爱护长城的同仁,期望共同推进长城保护与研究工作。

陕西战国秦长城调查与研究

段清波 于春雷

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所指的战国秦昭王长城,其实是战国秦、统一秦和西汉前期等三个时代前后相继,经过沿用、修缮、新建等各种形式建造后所存留下的长城;文献中屡见的汉“故塞”长城是西汉在战国秦长城的基础上加以利用新建而成的;战国秦长城的结构和体系不是我们习见的明长城模式,呈现出早期长城体系不完备的共同特征。究明布纹筒瓦的渊源及在秦地的传播过程,是判断长城时代属性的主要依据。

关键词:战国秦长城 布纹瓦 汉“故塞”

Survey and research of the Qin Great Wall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Duan Qingbo and Yu Chunlei

Abstracts: A specific part of the Great Wall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eferred to as the Great Wall of King Qin Zhao Wang in previous works, had been utilized, restored and even reconstructed during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including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he unified empire of Qin Dynasty and the early Western Han; The Gu Sai (old fortress) Great Wall of Han Dynasty, mentioned frequently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was actually rebuil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on the old foundation of the Great Wall of Qin Stat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mpared with the well known Great Wall of Ming Dynasty, the Great Wall of Qin Stat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ppears to be more primitive and incomplete in both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and defensive system. The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wide use of the cloth textured-semicircular tiles in the territory of Qin State could offer us an insight into the age of the Great Wall.

Key words: the Qin State Great Wall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arthenware in linen pattern, the Han Old Fortress

中图分类号:K 928.77

文献标示:A

文章编码:1676-9677(2012)03-0001-09

自东周开始建造长城以来,几乎每个时代都建有规模、长短、体系不同的长城,这些都成为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其间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历代长城作为规模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无不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历代长城中几乎没有一个时代的长城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无论是其走向,还是结构与体系,乃至沿用。这可能与多数长城修建在北方广袤的、环境恶

劣的区域有关,与长期以来它们遭受到风霜雨雪和人为的侵蚀有关,也和有关长城的文献描述较少或模棱两可的记载有关。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致力于长城研究的专家或爱好者,在田野调查时因为缺少文物考古的专门知识而影响了他们对这些遗存基本属性的判断。

鉴于我们对历代长城实际状况的了解程度,已经严重影响我们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2009年至2010年,

作者简介:段清波(1964—),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秦汉考古。

于春雷(1977—),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长城考古。

本文属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史长城研究》(10JZD0007)的阶段成果。

陕西省组织文物考古力量,实施了国家文物局、国家测绘局联合主导的“长城保护工程——长城资源调查”项目,对境内战国秦长城、战国魏长城、汉“故塞”、隋长城等早期长城资源进行调查。本文则对战国秦长城有关遗存本身的调查情况和收获作以报告(见图)。

通过调查发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谓战国秦昭王长城,其实是战国秦、统一秦和西汉前期等三个时代前后相继,经过沿用、修缮、新建等各种形式建造后所存留下的长城;文献中屡见的汉“故塞”长城就是西汉在战国秦长城的基础上加以利用、新建而成的,其走向和前人的调查成果相差不大;战国秦长城的结构和体系不是我们习见的明长城模式,呈现出早期长城体系不完备的共同特征。

一、战国秦长城研究的基本概况

历代文献关于战国秦长城修建的记载不太明确且简略,秦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面对不同国别和族群的压力下,似乎分别修建过“城堑河濒”“堑洛”“上郡塞”和秦昭王长城。前三者是否为长城,至今学术界还未成定论,但对秦昭王长城基本上没有异议。此前学术界对河套一带的故塞没有进行过专题研究与调查,只是习惯上默认故塞即为前朝的长城,至于其布局、走向与形态则无人提及。

1. 文献中的战国秦长城

关中平原洛河以东的黄河以西地区,是战国时期秦与晋以及三家分晋后魏国之间长期争夺拉锯的区域。春秋末的三家分晋前,秦国趁其内乱,蚕食夺取晋国在河西的大片土地,当时“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厉共公十六年(前461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①三家分晋后,魏国获得原晋国在河西的遗产,秦魏在河西遂展开持久的争夺战,魏文侯六年(前419年)“城少梁”^②,八年(前417年)“复城少梁”^③;“十六年(前409年),伐秦,筑临晋元里”^④,而秦国也因此在秦灵公六年(前419年)抗击魏国,七年(前418年)继续与魏国在少梁进行战争,在魏国的压力下于八年(前417年)“城堑河濒”^⑤。据此有学者认为这是秦国在黄河西岸沿河铲削修建的一道长城^⑥。

在随后几年的秦魏争战中,魏国处于攻势而秦国处于守势,魏国呈咄咄逼人强势进取状态,秦国步步为营不断退守。此时洛河以东的关中东部地区秦国基本上已悉数拱让给魏国,到秦简公七年(前408年),秦国不得已“堑洛,城重泉”^⑦,有学者认为这是秦国为防御魏国而沿洛河右岸修建的又一道长城,同时还认为“堑洛”长城正是把关中东部北起黄龙山、南至华山之间的平坦缺口给封堵起来,和富县长城(有研究认为是“上郡塞”)共同把关中变成一个封闭的范围。^⑧但也有学者认为“城堑河濒”和“堑洛”都不是修筑长城,或者只是一项水利工程而已,当时秦国只是将局部的河岸铲削,更多的

是利用自然的河流与陡峭的河岸进行军事防御,不能算作长城^⑨。

在秦国的北部似乎还有一道防线,即秦惠文王时建造的“上郡塞”。“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⑩。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惠文王时,在张仪的支持下,秦国在关中北部修建的又一道长城,并依据实地调查与文献考证,认为该长城位于延安市富县境内横跨洛河两岸,以防御北方的赵国^⑪。同时,通过对地形地势的研究,认为关中北部有一个缺口可以沟通南北,而富县长城就是为了封堵这个东起黄龙山,西至子午岭之间的缺口,与上述的“堑洛”共同将关中封闭护卫。但也有学者认为将“上郡塞”解释为长城缺乏根据,应该是在上郡某地所建的要塞^⑫。

在所有战国秦长城中,秦昭王长城的位置和走向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一道长城,史载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秦灭掉义渠之后,^⑬“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⑭并有史念海、彭曦等多位学者及陕西文物部门对此长城进行过调查研究。相关学者还通过详细研读文献,考证在靖边县向东沿大理河南岸分出一支线长城,达绥德再向北沿无定河西岸至榆阳区鱼河堡止。该长城修建于秦昭王之时(前306~前251年),一直作为秦国与西北诸邻的界线,直至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因有“亡秦者胡也”的图录,“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⑮至此秦昭王长城就不再作为秦国的西北边界。

2. 文献中的汉“故塞”

顾名思义,“故塞”即过去的塞,指前朝的防御设施。史载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本已被蒙恬驱逐到阴山以北的匈奴又返回河套地区,头曼单于在蒙恬死后就“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⑯该故塞遂成为匈奴与秦朝之间的分界线。汉初楚汉战争期间,面对北方强大匈奴不断南下的压力,西汉帝国与匈奴媾和,以前朝故塞互为边关,“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⑰或被称为“河南故塞”,同类长城见于史籍的还有“辽东故塞”。

以故塞与匈奴为边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⑱于是这道秦统一及汉初的“故塞”就不再作为汉匈边界使用了,其使用时间前后长达82年。至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等降汉,“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⑲自是之后,终西汉之世该故塞就作为汉朝内服胡人属国的南界使用了。

二、调查所见战国秦长城与汉“故塞”

关于“塞”和“长城”,有学者曾用心讨论过他们之间的词

义区分和实际形态差别,多数认为塞不当作长城讲,认为塞是点上的防御设施,长城为线状防御设施。其实,古代文献以及古人并没有对二者之间认真地区分过,尤其是在东周时期。当然塞和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前者出现一定会比后者为早,相对而言,就防御型态和体系来比较,长城的确要比塞不仅规模大,而且体系相对复杂。“长城、钜防,足以塞”^②,因之它们在功能上是没有区分的。从我们调查河西魏长城和秦昭王长城所了解的形态而言,也证实早期长城其实就是在塞的基础上添加为数不多的、长度不长且不连续的墙体而成,这样直到西汉,人们依然将二者混称,尽管此时长城早已名声鹊起。

(一)“城堑河濒”、“堑洛”

文献中的“城堑河濒”和“堑洛”遗存,在实地调查中没有任何发现。在反复研读文献的基础上,虽然经过认真调查,在沿黄河西岸的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城堑河濒”的遗迹和遗物;在洛河右岸,经过对以往认定的100余千米长“堑洛”线路全面调查,没有发现人工铲削痕迹;沿线也没有发现战国时代的夯土墩台。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确认“城堑河濒”和“堑洛”是否有过以及是否属于战国秦长城的范畴,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资说明的遗存,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持否定意见,即他们不属于战国秦长城体系。这种存疑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明代延绥镇所辖的明二边长城现状或许可以说明此类“铲削”痕迹难以发现的状况。二边是成化年间基于蒙古部族不断南侵的局面由延绥镇巡抚余子俊主持建造的,其形式在文献上明确记载为“依山铲凿,令壁立如城,高可二丈五尺;山坳、川口,连筑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墩,添兵防守”^③,此即为后来相对有连绵墙体的大边长城而言的“铲削二边”。经过两年的调查,这道铲削而成的长城,全线只发现零星几处人工垒筑的墙体,并没有发现任何铲削痕迹,而时光仅仅不到500年。可想而知,倘若战国秦长城体系中有经过“堑”而成的防御形式,时至今日无法觅其踪迹也是可能的。

(二)上郡塞

过去,史念海、姬乃军等将跨越富县县城周围的钳二乡、城关镇和茶坊镇呈西北东南走向、段状分布的约30千米的一段长城,判断为其属秦惠文王时期张仪所建造的“上郡塞”长城,而欧燕却认为其属战国魏长城。我们发现在关中通往陕北的通道上,在南部沮河段通道的宜君、黄陵两县及北部洛河段通道的富县,有成段状分布于孔道的墙体,还有少量的墩台以及含有战国时期富有秦魏两国特征的内麻点文和内布纹瓦片的遗址;另外,在黄龙山南麓还有一道长城。该段长城遗存在东部黄龙山区和西部有不同的特征之分。东部即韩城以北的黄龙山南麓,单体建筑体较少,没有发现属于秦国的瓦类遗存,盛行内布纹的筒瓦、板瓦,表明此段长城属魏

国新建;西部即宜君、黄陵、富县部分,墙体仅建造在关口一带,每段墙体较短,墙体沿线不见瓦片分布,这和秦昭襄王长城墙体沿线发现较多瓦片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该段墙体夯层较薄,宜君一带发现的墙体夯层仅3.4厘米,其夯层的厚度也比秦昭襄王长城薄,表明此段长城的墙体属魏国占据该地后所建。此外,该长城沿线单体建筑很少,在富县全长18千米的长城沿线只有一座烽火台,再无其他单体建筑,这也和秦长城差异甚大。关堡类军事据点所发现的瓦类遗存有两种风格,一类是属于秦国的内麻点文筒瓦,一类是属于魏国风格的内布纹筒瓦,富县圣佛峪遗址还发现内麻点文筒瓦被夯夹在墙体中的现象,而该遗址内布纹瓦则大行其道,说明秦国最早拥有该地、其后被魏国占据的过程,黄陵县侯庄乡韩庄村遗址发现的遗物也表明同样的历程,并且发现了秦长城体系中没有见过的动物纹圆瓦当。

经过调查,我们认为,分布于延安地区南部的黄陵、宜君及富县长城,为秦魏两国先后修建沿用而成,其中墙体部分为魏国所建,关堡部分多数为秦国始建、魏国沿用。分布于黄龙山南麓的长城,属于魏国修建。

这道军事防御线路有着较为复杂的建造和利用过程,秦国和魏国先后使用过这道长城,最后在惠文王时期又回归秦国,在此过程中分别留下各自的遗存。这道防御体系所反映的历史进程是,春秋战国之际,秦国向外扩张过程中占据了关中北部和关中东部,在关中北部的宜君、富县、黄陵一线修建军事性据点,用以防备来自北方晋国(后是魏国)的侵袭;三家分晋后,秦国在魏国的步步紧逼下从该地退却,魏国遂重新占领原属晋国的领地,随后伴随着秦国国力的提升,魏惠王时期,魏国在关中北部、东北部沿黄龙山一线,在原秦国军事据点的基础上,新建了旨在防御秦国北进的长城——规模较小、连续性较差的墙体;秦惠文王时期,秦魏两国发生关中北部甘泉雕阴之战后,魏国不得已退出陕北,秦国遂占领该地,但秦国此次占领关中北部后已经无意以此为界,接受上郡后并没有在此再次修建军事防御体系。张仪上郡塞所指的并非是新建的防御工事,仅指魏国割让上郡后秦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利用了这道防御体系。

(三)秦昭王长城与汉“故塞”

秦昭王长城自东北向西南经内蒙古、陕西、宁夏和甘肃四省区。该长城自神木县大柳塔镇贾家畔陕蒙交界处入陕西境,至吴起县庙沟乡大洞村陕甘交界处出陕西境,沿线经过神木、榆阳、横山、靖边、志丹、吴起等区县,从吴起出陕西境后,经过甘肃的华池、环县、镇原、彭阳,宁夏的固原、西吉、静宁,甘肃的通渭、陇西、渭源直到洮河东岸的临洮止。

陕西境内的战国秦长城中只有所谓的“秦昭襄王长城”体系最为完备,走向最为清晰,遗存现象清楚。经过对这道长城沿线墙体及关堡的地势、地貌与分布特征以及沿线发现的

遗存特征对比研究,我们认为这道长城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秦统一后沿用,西汉早期继续修缮、沿用并以此作为阻隔南下匈奴之间的边界;西汉时期曾经至少两次对该长城进行过维修和新建;战国秦时期虽然墙体段落很少,连绵性较差,但墙体上覆盖有筒瓦板瓦现象为东周长城所仅有;西汉前期不仅新建了连续性很好的未曾覆瓦的墙体,并且增筑了大量的烽火台,从而完备和丰富了该段长城的防御体系。学界长期沿袭所谓的“秦昭襄王长城”,其实是战国秦、秦统一和汉故塞长城的混合体。

1. 走向与分布

秦昭王长城自内蒙入境后,在明长城西北侧延伸;至榆阳区十八墩与明长城交汇,至榆阳区黄沙磧墩与明长城分离;其后继续沿明长城西北侧布设,越无定河后与明长城相交;继续前行,分布于明长城东侧,向南延伸至靖边黄草孤与明长城两次相交,小段分布于明长城西北侧;西南方向前行直至进入甘肃界处,皆分布在明长城东南侧。

该长城在白于山以北,大体上沿毛乌素沙漠东侧和南侧边缘分布。具体线路是沿陕蒙交界处的勃牛川、窟野河西岸南下,沿窟野河与秃尾河之间的分水岭向西南延伸。其后再沿秃尾河支流团团沟与喇嘛沟之间的分水岭向西南延伸至秃尾河东岸,越过秃尾河后经芦沟与红柳沟之间沙漠区域向西南延伸,越红柳沟后在其南岸进入榆阳区境。

进入榆阳区范围后,长城沿红柳沟南岸向西偏南延伸,越过钵钵梁再沿头道河(常乐川)南岸向西南延伸,在榆林市区以北的红石峡处越过榆溪河,顺无定河流域北侧向西南延伸至无定河北岸,越无定河进入横山县境。

进入横山境内长城沿芦河西岸向南延伸,入靖边县境。

进入靖边的长城,经瓦渣梁越过芦河向西南延伸,至龙州乡黄草孤与明大边长城两次相交后,向南沿芦河与大理河分水岭至天赐湾拐向西南,再沿芦河和延河的分水岭白于山脉向西偏南延伸进入吴起县境。

进入吴起县的长城沿洛河和红柳河之间的分水岭向西偏南延伸,越洛河支流薛岔沟进入志丹县境,再沿薛岔沟、杨青川的分水岭延伸,并再次进入吴起县境,转向西北延伸到杨青川南岸,沿南岸向西延伸,到小桥峁岷越过杨青川,再沿北岸向西延伸并越过洛河,继续沿洛河西侧支流三道川北岸向西南延伸,至长官庙乡阳洼村越过三道川,再沿洛河和泾河的分水岭向西偏北延伸,至庙沟乡曹儿畔大洞出境进入甘肃省境。

2. 保存现状

该段长城体系由长城墙体、附属建筑(包括单体建筑与关堡)组成。线路全长458千米,其中夯土墙198千米,石墙20千米,山险墙100千米,河险9千米,山险3千米,消失段127千米;原已发现、经此次调查证实的部分,全长187千

米;此次调查新发现的部分,全长226千米;此次调查没有找到相关遗物、线路不明的部分,全长约42千米(见附表)。

马面15座;敌台350座;烽火台85座。

(1) 墙体

是长城的主体部分,全长458千米。

墙体依据建筑类型、材质及保存状况,分为山险、山险墙、石墙、土墙。调查显示,不同类型的墙体主要是和不同的地质地貌相关,在岩石山区,墙体类别主要是石墙和夯土墙;沙漠平坦地区则是夯土墙;在有山沟河流的地方则利用自然地形以山险为凭。

石墙只在神木县发现,主要分布在秃尾河以东,采用片石垒筑或土石混筑的方式砌造,内外两侧以片石叠加,中间填筑黄土或大小不等的块石;或一侧为片石砌筑,一侧为夯土墙,因地制宜,不拘一格。石墙存留长20千米,墙体底部宽度在2~5米不等,最高达22米;片石厚度在0.02~0.14米之间。

全线大多墙体以土墙为主,但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沙漠地带,即秃尾河以西的神木县部分、榆阳区、横山县和靖边县芦河以北区域以及吴旗、志丹的部分区域。夯土墙的墙体基本上是在沙地或黄土地上直接夯筑,现存的墙体全长198千米,底部宽度在2~8米之间不等,高度最高达5.8米;夯土以黄土为主,含沙量较大,夹杂有料礞石,有的部分夹杂有一些外绳纹、内麻点纹或布纹瓦片;夯层厚度大部分为0.06~0.11米。

山险墙主要分布在靖边、吴起、志丹三县的白于山区,以铲削和筑墙相结合,全长100千米。山脊部分的夯土墙相对而言要窄小一些,底部宽度在2~3米之间,高度最高达2.5米。调查发现,夯土墙外侧山坡上有多层向外侧倾斜的梯田,内侧壁面每一层的高度在3~5米之间,向上收分率基本为1/3,每一层的堑台面宽度在9~15米之间不等,向外落差1~3米不等;夯土墙与外侧的堑就构成一道山险墙,过去把这种迹象称为“三道堑”。据当地耄耋所言,非近代人工所为,但考虑到黄土山区的水土流失性,我们无法确认这是秦汉之际的人工痕迹。

由于自然的侵蚀与人为的破坏,该长城有大量的消失段落,长约127千米,多分布在环境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包括沙化区和沟壑发育区。

全线共有约12千米长的范围内未见墙体,包括沿线长城所跨越较大的河流,有西拉木伦河、秃尾河、无定河和洛河,跨越河流段及河流两岸不见长城遗存。但该地沟深壁陡,流水滔滔,也许可以成为自然天险。

(2) 附属建筑

包括单体建筑与关堡。单体建筑是指建在墙体上的马面或与墙体相连的敌台及墙体附近的烽火台,其功能是用以瞭

望防守;关堡包括依墙而建的关和离墙而建的堡,用以屯兵居住。

单体建筑:马面依墙而建位于墙体外侧,现存 15 座;敌台骑墙而建或依墙而建但位于墙体内侧,现存 350 座;沿线发现的烽火台现存 85 座。由于年代久远,坍塌严重,已无法看出最初的形状,大部分平面形状呈椭圆形或圆形,直径在 3~8 米之间不等,高度最高达 4.5 米。其中位于山险墙部分的敌台都是依墙而建,位于墙体内侧,体量较小,直径多在 5 米以下,高度也较矮,一般不超过 3 米。单体建筑保存数量和程度不一,西部山区保存较多,而在中部沙漠区和东部山区多消失不存。从残存的墩台看,马面和敌台分布间距较小,多在 200 米左右。少部分敌台和烽火台曾在明代沿用并改筑成方形墩台。

有关关堡:沿线现存 14 座关和 8 座堡。关堡平面都是呈矩形,长宽在 20~180 米之间不等,有 11 座的长宽尺寸在 40~70 米范围内;墙体多残缺不全,大部分只剩下四个角或者更少,高度最高达 6 米,多在 3 米以下。

(3) 遗物

在长城墙体沿线发现的遗物以瓦片为主,一般瓦片集中的地方就是有附属建筑的地方,反之瓦片就较少。瓦片分布比较多的地方相对的长城保存状况就差一些,而在长城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的地段,瓦片分布就较少或者没有。

瓦片有筒瓦和板瓦两类,筒瓦外表纹饰主要是绳纹,另有素面和少量的环轮纹;内侧纹饰有麻点纹和布纹两种,麻点纹分为散乱和整齐均匀两种形式,布纹有粗疏和细密两种之分。瓦当有素面半瓦当和几何纹与卷云纹圆瓦当。板瓦外侧纹饰绳纹、环轮纹、素面,内侧饰麻点纹、菱格纹、绳纹,或为素里。

调查中于长城沿线还发现有秦汉半两、铁锺、铜铍、铜削、铁削、铜匕首、铜杖头等。另外,在关堡及单体建筑周围还散落一些绳纹陶片和素面陶片。

(4) 障墙

调查中还发现一种新的夯土墙体式的防御体,一般位于长城墙体(位于半山坡处)后侧的山顶平坦处,宽度大于长城墙体,长度为数十米或再稍长,夯土墙两端或一端夯建一座与之不相连接的墩台,这些墙体周边甚少见到瓦片一类的遗物,墩台周边能见到零星的瓦片,瓦片有内布纹和内麻点文之分。

陕西境内共发现这类障墙 6 段。其中神木的杨旺塔村段障墙长 52 米,呈西向东,与杨旺塔村长城 1 段呈垂直状,墙体宽 2.8 米、高 0.65 米,石块垒筑,墙体内填碎石。靖边盘龙梁村障墙,长 44 米,与新城乡黑龙沟长城平行,南距黑龙沟村长城 25 米。吴起石碑湾村障墙,长 24 米、墙体顶宽 2 米、底宽 5.4 米、高 3.2 米、夯层厚 0.07~0.11 米,呈北南向,与石

碑湾村长城 1 段基本垂直,间距 235 米。

由于在这类设施附近发现内布纹筒瓦,我们分析其建造于汉代,调查时登高观察周边状况,可视域明显优于在墙体上看到的景象,同时也可以即时地将观察到的敌情信息传递到远方,而站在墙体附近墩台上则达不到这一效果。

三、几点认识

(一) 关于“城堑河濒”和“堑洛”

虽然没有发现文献中所记载的“城堑河濒”和“堑洛”的迹象,但考虑到时代背景以及环境状况,我们无法排除当年曾经有过这样的举措。合理的推测是,当年只是将局部的河岸铲削利用后加以防御,更多的是利用自然的河流与陡峭的河岸进行军事防御,就此而言,他们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长城系统。

《史记》所记“城堑河濒”和“堑洛”分别是秦灵公八年(前 417 年)与秦简公七年(前 408 年),前后相差九年,其间发生的事情还有魏筑少梁、临晋、元里和雒阴,还有秦晋战于郑下,秦败魏胜。可知此阶段秦晋之间形势是秦退魏进,拉锯的地方就在河洛之间的西河地区,直至出子二年(前 384 年),“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②可知“城堑河濒”是秦国利用黄河来防御魏国的一种措施,假如此天险不能有效地防范就退守洛河一线再组织力量防守。但后来魏国并没有越过洛河,两国界线就在洛河一线暂时稳定下来。

以当时的情势看,退守洛河后,秦国必然会利用洛河作为一道天然的防线来防御魏国的前进,但通过实地调查,洛河西岸并没有发现多少遗迹,大概利用洛河来防御东方的魏国,只需要将右岸铲削之后即可吧。洛河自北向南穿越的区域均属黄土高原,黄土具有很好的直立性,现今的洛河两岸大多作壁立状,那是由于洛河侧蚀致使两岸崩塌所致,现在依然能看到这种崩塌时有发生。洛河西岸发现很多夯土墩台,这种墩台体型瘦高,与可以确定的任何时代的敌台或烽火台都有明显的区别,沿岸发现的墩台在关中东部较为常见,据说那是当地村民依据堪舆理论为所居住的村庄挡引风水的设施,与长城无涉。在渭南蒲城发现的“洛渭漕渠”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堑洛”遗迹,其依据就是渠壁发现的一系列包含汉代遗物的灰坑,并且在两岸发现了战国秦遗址,位于西岸的遗址明显多于东岸。不过,依据漕渠与灰坑之间属打破关系看,显然漕渠时代晚于灰坑,不会早于汉代,当然也就与所谓的“堑洛”无关。

以“堑洛、城重泉”同时记载看,所堑地方应该是位于渡口便于通行之处,目的就是切断通道。这样的地方在战国时可能只有重泉附近和元里附近的洛河口岸具备这样的条件,以秦晋数次在元里交战与和谈看,可知此处应该是交通咽喉,附近洛河应该很容易渡过;重泉位于商原铁镰山南侧洛

河对岸,附近有船舍村,可知该处也是交通要冲。另外,这两处地方现今仍然是交通道路跨越洛河的地方。当时秦国只是以洛河为边界,并利用天险防御魏国,不能等同于秦国在西岸建造有长城体系。“城堑河濒”也是类似的情况,这样的工程最多算作路障,不能视为长城。

(二)关于秦昭王长城与汉“故塞”

1. 有关秦昭王长城部分线段分布状况的思考

长城的防御方向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特别予以关注的一个问题,秦昭王长城是在灭掉义渠并占有了陇西、北地和上郡以后修建的,又经过西汉前期的修缮新建而完善。现状表明该长城多数线段的防御方向是自内侧防御外侧,即东南方向的力量防御来自西北方向的侵扰,这符合该长城修建的历史背景。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个别段落似乎并非如此,从地貌和长城所处的位置看,显然属于外侧防御内侧的情况。该长城有部分段落修建于山梁的南坡或东坡,也有部分线段位于河流的西岸台地上,其地势明显不利于自东南防御北侧或西侧,这样的段落主要是分布在神木县北部勃牛川、窟野河西岸、横山县芦河西岸和吴起县西南部三道川北岸。

勃牛川是窟野河上游一条支流,源于内蒙境内,自北向南沿毛乌素沙漠东南边缘流入陕西,分布在神木县境内这段长城墙体,“沿着河川西面的一个个梁峁爬上爬下,其东临河,紧切峭壁陡坡而筑,显得格外险峻挺拔,西面则是一个个八字形的支沟和两条支沟之间的马鞍形低地。山岭的顶部正当‘贼冲’,土厚地阔,往往筑有高大的墩台。”“到神木县城西北方与西南——东北行的明代长城相交后继续向南伸延,直抵兔毛川汇入窟野河的河口二郎山”^②,墙体材质以石墙为主,两面垒砌石板,中填细碎石块。尤其是城墩村墩台的地理位置及与墙体的关系,更显示出早期防御方向为自西北向东南,晚期为自东南向西北的转变过程。墩台东临陡坡,西面有一大片开阔地,建造在山岭最高处,突出长城之西的这块墩台是后来补筑的,而城垣与其东突的那块墩台则浑为一体,是同时夯筑的,土质纯净,补筑部分的夯土中夹有碎陶片,二者泾渭分明,迥不相同。从军事防御方向看,为自西北防御东南方向的进攻,倘若秦国修建,其防御方向明显和其他线段的长城自东南防御西北的布局不同,而秦国控制的区域应当位于长城的东南侧,西北侧为戎胡之地。

横山县段秦昭王长城分布在芦河西岸,但不是在最高处,而是在半坡上分布,部分距河岸边约100~200米,最远距离河岸也就是300多米。而同样行经此地的明长城则是在芦河与黑河的分水岭上分布,位于秦长城西侧2~5千米处,相互平行。以这种分布地形看,更应该是西部防御东部的军事工事,而非往常所认为的东部防御西部的态势。

吴起县西南东西向的三道川是洛河西侧北数的第三道支流,故名三道川,秦长城在该处主要沿河流北岸分布。按照

地理地势看,长城位于三道川北岸山岭的南坡上,应该是北侧占尽地利,为防御南侧而修建,此前有学者曾认为此处的长城分布在三道川南岸,^③但经过详细调查,三道川南岸没有发现墙体,而在三道川北岸分布有一道断续相接的夯土遗迹,夯层厚度与夯筑方式等与他处秦长城夯土一致,且沿线有较多的外饰绳纹、环轮纹,内饰麻点纹的瓦片。同类情况也见于杨青川北岸。在其他段落中,尤其是白于山上的段落,还有若干这样的小段长城,他们位于山岭的东南坡,展现出西北侧占有防御地利的态势,但每段长城确实和两端的长城都相互连接,尤其是其中有一些小的段落明显是为了省工省时,长城在山间一条直线相连,从某个凸出山岭的东南坡经过,将山岭高处置于长城西北侧。

上述三处长城遗迹虽然在地形地势上使我们认为该长城并非是东南防御西北,但这几段长城却又和其他段长城明显相连一线,而其他段长城则也有明显的东南防御西北的特征,像处于山体的西北坡上、长城本身两侧地形东南侧高于西北侧约十几米、沿线关堡都处于长城东南侧等等。

对于秦昭王长城部分段落出现这种分布状况的原因,我们有一种推测,即这些段落的长城属有前后沿用的可能,最早为赵国所建,其目的是自西北向东南防御秦国,后来在秦国的压力下,赵国退出该地区,秦昭襄王时修建长城利用,完善该段长城,遂构成秦长城的一部分。因为在三家分晋前,晋国的力量尚未到达这里,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略取西北胡地后(前300年),在阴山南坡“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④,此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目的而建造;其后,前299年赵武灵王以主父的身份,“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⑤,并且还乔装打扮以使使者身份南下咸阳拜会秦昭襄王,目的是观察沿途地形地貌环境和秦王处事风格。秦国从魏国手中获取的上郡,其北线我们并不确知,但从昭襄王二十年(前288年)“之上郡、北河”看,此时河套以南地区应该已经归属秦国了,此后于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修建长城,那么,赵国占据河套以南的时间段当前300年至前288年之间。但现今榆林、延安之间地带此前的归属或为赵或为秦,考虑到秦昭王十二年(前296年)赵惠文王三年,赵国灭掉中山国后将中山王迁到肤施的情形看,^⑥肤施为赵国领土,如此的话,不论肤施在延安或者在榆阳堡,在秦昭襄王“之上郡、北河”之前,该地当为赵国所有。

从先秦游牧民族甚少或不见他们修造长城的史实上看,分布于神木县勃牛川西岸、吴旗三道川、杨青川的长城就只可能为赵国所首建,在步步向北退却的情况下,建造长城其目的是旨在阻止战国后期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继续北上,又凭此可以作为赵国向南攻略秦国的桥头堡。到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建造长城时利用了这段长城,从而改变了防御方向,因之,墙体、墩台等均有新筑和修缮行为。

赵国北长城和秦昭王长城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墙体上没有筒瓦、板瓦覆盖墙顶,而后者则不同,已经发现的战国秦长城墙体沿线均发现连绵不绝的瓦片,即使在沙漠地区墙体早已或掩埋于流沙中或消失,但地表仍能见到连续性的瓦片,则秦长城墙体顶面覆盖有瓦,当属无疑。

阴山南麓赵长城因地制宜,石墙与夯土夹砂墙并用,南侧及沿线分布有烽火台和障墙遗址,墙体沿线没有发现瓦类建材,外侧发现有壕沟。而陕北神木发现的这些长城,其墙体外侧也有壕沟现象,墙体附近多发现呈战国秦特征的麻点纹筒瓦残片。我们推测,这类墙体是秦国对赵国长城的再利用和改建。当然对这一现象或许还有更好的更合理的解释。

2. 汉“故塞”沿用秦昭王长城的证明

汉“故塞”即为沿用秦昭王长城而成的观点过去就曾有过研究者提出过^⑧,只不过当时并没有提出依据。经过此次调查,在秦昭王长城沿线发现不仅发现具有鲜明战国秦特征的筒瓦板瓦以及战国秦半两,也发现属于秦统一时期的铁铤铜铍,更发现大量汉初器物及大量的具有汉代特征筒瓦、板瓦,尤其是墙体夯层中不仅夹含有内麻点纹筒瓦,还夹杂有外绳纹内布纹的瓦片,由此可以确认,所谓的汉故塞就是西汉前期对战国秦长城加以利用、完善并新建而成的长城体系。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现场看到的所谓的秦昭王长城,其实是战国秦(赵)、统一秦以及汉代前期三个时期前后沿用、修缮、完善而成的长城。

调查时在秦昭王长城沿线发现大量的外绳纹、内布纹的瓦片和卷云纹的瓦当,这些特征显示其时代属典型的汉代遗物。另外还发现一些具有汉代特征的遗物,在发现的二十四枚“半两”中,只有一枚是秦“半两”,其余都是汉“半两”,另外还发现一枚榆荚“半两”,但是没有“五铢”。还发现十八枚铜铍,其中有铁铤铜铍八枚。

长城沿线存在为数较多的汉“半两”,说明汉初对于该长城使用的深度和广度要超过战国与秦代,表明汉代长城沿线驻守有人数较多的军队。铁铤铜铍在秦代并不常见,秦始皇兵马俑三个坑出土数万枚铜铍中,铁铤者只有数枚而已^⑨,而时隔千年,我们在长城沿线上还采集到八枚铁铤铜铍,说明这些铜铍的时代当为汉代而不会早到秦统一时期。汉代在该长城沿线的大量驻军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汉初与匈奴的关系远比秦昭王至秦始皇时

代紧张,对此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大量汉初钱币的发现同时也能说明汉初长城沿线的人员流动和商业交通远较以前发达,史载“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

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⑩可知汉匈之间的关市是从汉文帝时代(前179~前157年)开始,至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失败,汉匈交恶,但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直至“自马邑军后五年(按:即元朔元年、前128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元朔二年(前127年)河套南部的关市才由于汉朝大力出击匈奴而结束。

沿线发现的瓦片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外绳纹内麻点纹;另一类为外绳纹或环轮纹,内布纹或菱格纹。前者类型的瓦片在秦雍城遗址、咸阳宫遗址和秦始皇陵均有大量发现,而同遗址中,后者在咸阳宫遗址仅看到一片,秦始皇陵仅有不到十片,^⑪可以判定外绳纹内麻点纹是秦瓦的鲜明特征;后者类型的瓦片在汉长安城遗址和汉代帝陵均有大量发现,而前者类型的瓦片只在早期帝陵有所发现,可以判定外绳纹或环轮纹,内布纹或菱格纹是汉代瓦片的特征。在调查过程发现有的墙体部分或单体建筑夯层中分别夹杂有上述两种类型的瓦片,说明汉代曾经至少两次维修过这道长城,第一次维修时曾将战国秦的麻点文瓦片夹入夯层内,第二次维修时将此前的汉代建材瓦片夯筑在墙体内,这说明我们现在看到的秦昭王长城墙体遗迹大部分是经汉代维修后的结果。

3. 秦昭王长城的布设与结构特点

不论是战国秦还是统一秦乃至汉初,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段内,该长城作为内陆的西北边防,其军事防御也呈现出与时代、作战对象、冷兵器时代兵器与作战方式相一致的特性来。

其一、秦昭王长城并不布设在山脊部位。

进入火器时代的明长城墙体,在山区环境下几乎全部布设在山脊上,相对而言处于冷兵器时代的秦昭王长城墙体则基本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其线路多数分布在山体一侧的半坡上,这和明长城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差异。这应该符合当时战国秦汉之际的战争应对方式,作为防御方的农业民族军队,属于以步兵为主作战的时期,其远射兵器为弓弩,常规武器不外乎刀枪剑戟一类;而进攻方的游牧民族军队,则以骑战为主,对阵的双方呈现出不同优劣态势。长城作为守方的

陕西省秦昭王、汉长城各县各类型分布统计(米)

秦汉长城	神木	榆阳	横山	靖边	吴起	志丹	总计
山险	0	0	0	0	3127	0	3127
山险墙	0	0	0	56620	31069.4	12750	100439.4
石墙	20251	0	0	0	0	0	20251
河险	6600	270	1105	0	985	0	8960
消失段	38029	47502	16698	25200	0	0	127429
土墙	40354	39485.2	38981.7	21797	57645.6	0	198263.5
总计	105234	87257.2	56784.7	103617	92827	12750	458469.9

防御体,最佳的防御效果莫过于将对方的骑兵有效地阻挡在山前地带,这样弓弩一类的兵器就可以在对方发起进攻时处于上坡、速度慢的劣势,将之有效地击退;倘若第一轮进攻时防线被突破,还可以后撤再组织防御,而进攻一方的骑兵在爬山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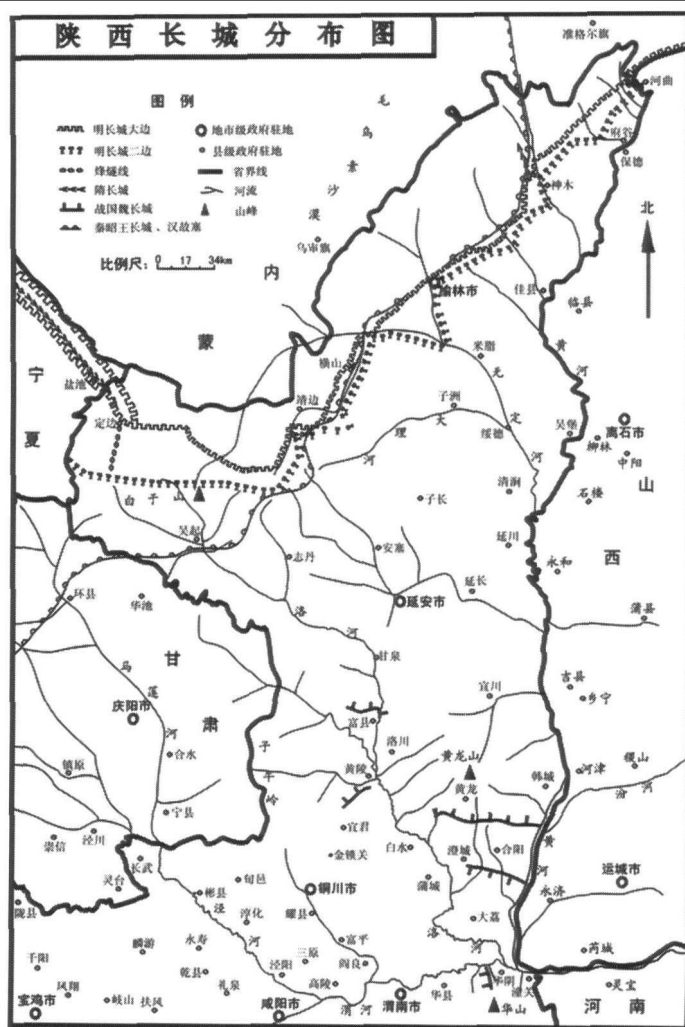
其二、沿线长城墙体上墩台分布密集、部分墩台分布在山顶。

墙体上的墩台均依墙而建且高于墙体,山区处墩台的密度很大,间距小者有 50 米、80 米的,多数墩台之间的距离在 200 米左右,在地势稍微平缓的沙地、平原地带,分布要稀疏一些。山区地带的墩台一般设置在沟壑或谷道正对的墙体部分,或者设置在河道拐弯处以及多个河道交汇处,开阔的可视域能将沟壑或谷道内的动态尽收眼底。墩台的密度大,可能和战事形势趋紧有关,作为防守的一方,两座墩台之间采用弓弩来守卫,能对进攻者进行有效的打击。该长城墙体上墩台间距 200 米左右,恰好相当于弓箭有效射程的 2 倍稍小,所以设计墩台间距应该是按照在相邻两墩台上相对射箭能将该段范围全置于射程之内的要求而定。^②

沿线多数墩台周边发现大量的瓦片,瓦片内侧纹饰既有麻点纹也有布纹,即表明这些墩台上当年曾建有固定的有顶覆盖的建筑,也表明墩台屋面建筑的时代既有战国秦的、也有汉代的。分布在山顶的墩台不论是规模还是保存状况,均优于墙体上的墩台,墩台周边的瓦片中布纹瓦多于麻点纹瓦,我们推测建于山顶上的墩台当为汉代。墙体上的墩台有些属战国建造,有些应该为汉代添建或沿用修缮,只不过现在还不能将之一一理清。

其三、秦昭王长城沿线墙体存在大量汉代新建的现象。

现今看到的长城墙体基本上呈现出较好的延续性。调查中发现,某些线段的墙体两侧分布有较多的瓦片,而有些线段则几乎不见瓦片,一般情况下,墙体保存较好的线段,瓦片分布的较少,墙体保存较差的线段瓦片分布的较多。在一些保存好的墙体夯层中发现夹含有布纹筒瓦残片的现象。基于此,我们认为,战国秦长城墙体连续性很差,墙体上覆盖有板瓦筒瓦,墩台分布的较为疏散,经过汉代的修缮、新建,该长城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形态,即墙体连续性好、墩台密布。就墙体而言,汉代时墙体上没有战国秦时期那样覆盖筒瓦板瓦的现象,这也表明,前后两个时代利用墙体时的防御方式完全不同,汉代时守城的将士可以在城墙上巡视防守,而战国时战士并不在墙体上巡守,仅依靠墩台瞭望和防守,这或许与战国气候相对湿润降水较汉代多有关,^③或许与前后两



个时代的防御思想、防御方式有关。

4. 秦昭王长城的废弃、再沿用和破坏

该段长城直到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后才彻底废弃,始于周赧王四十三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至于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 年),前后沿用将近 150 年。此后史称“幕南无王庭”,匈奴浑邪王降汉后,于五郡故塞外,设立属国,此时“故塞”就不再是作为重要的军事防线来使用,但依然是一条胡汉之间的界线。

西汉以后直至隋代,该长城一直是废弃状态,隋代修筑灵武到朔方的长城有部分段落与该长城重合,这样的段落可能存在于神木县西部、榆阳区、横山县和靖边县东部,因为调查过程中,在该地段没有发现确认与疑似的隋长城遗迹。明长城榆阳区中部麻黄梁镇十八墩至芹河乡黄沙磧墩 30 千米段直接和该长城分布线路重合。

注 释:

①《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99 页。

②《史记·魏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838 页。

- ③《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05页。
- ④《史记·魏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38页。
- ⑤《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05页。
- ⑥ 史党社、陕西渭南地区的秦魏长城及城址考察，《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3年第1期。
- ⑦《史记·六国年表》，但在同书《秦本纪》记此事却在秦简公七年（前408）。据阮燕考证应该以《六国年表》为是，此从。详见阮燕、叶万松：“上郡塞”与“陂洛”长城辨，《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 ⑧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文博》，1994年第1期。彭曦：《秦简公“陂洛”遗迹考察简报》，《文物》，1996年第4期。
- ⑨ 阮燕、叶万松：“上郡塞”与“陂洛”长城辨，《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 ⑩《史记·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⑪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 ⑫ 阮燕、叶万松：“上郡塞”与“陂洛”长城辨，《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 ⑬《后汉书·西羌传》，“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 ⑭《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5页。
- ⑮《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⑯《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7页。
- ⑰《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90页。
- ⑱《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6页。
- ⑲《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34页。
- ⑳《战国策·秦一·张仪说秦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5页。
- ㉑（明）张懋、刘吉纂修、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93，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6年。
- ㉒《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0页。
- ㉓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神木县窟野河上游秦长城调查记[J]，《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
- ㉔ 彭曦、战国秦长城等考察与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7页。
- ㉕《史记·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㉖《史记·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㉗ 肤施地望有两说，一说在今榆林榆河堡，一说在今延安宝塔区。
- ㉘ 史党社、田静、追寻秦昭王长城[J]，《文博》，2004年6期。
- ㉙ 在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出土铁280簠（每簠约100枚），另有零散的10896枚，其中只有1枚铁簠和2枚铁簠铜簠，其余均是铜簠。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编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75页。
- ㉚《汉书》卷94下《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30页。
- ㉛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 ㉜ 有调查研究认为平坦地势处墩台间距在210米~240米，符合当时

时之百丈（相当于230米）长度。见彭曦：《战国秦长城等考察与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另外，关于明代弓箭射程要求小于战国，由于当时沿边均配有一定数量的火器，弓箭处于次要地位。见于春雷、陕西榆林明长城新发现“平城墩石碑”考[J]，《文博》，2008年3期。

③ 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J]，《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责任编辑：赵 夏）

（上接17页）修边活动中不断的改弦更易与反复曲折，相关记载较为零散。本次调查中结合新发现壕堑与考古发掘，并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爬梳与比对，基本搞清了该地区明代筑边的历史，确定了相关长城遗迹的时代与属性。

这三则新发现属本次长城资源调查中宁夏调查工作的重要收获，为研究宁夏地区以及中国明长城修筑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深化了对相关长城遗迹内涵的认识，也为以后开展相关长城的维修、保护提供了基础信息与一手资料。

注 释：

- ① 韩兆民、许成、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M]，《中国长城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45~51页。
- ② 许成、明代对固原附近战国秦长城的利用[C]，《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12~16页。
- ③（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九《葛霸附葛怀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9701~9702页。
- ④（清）《雍正甘肃通志》卷十《关梁》“固原州”，四库全书影印本，叶45a。
- ⑤《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二〇三，“嘉靖十六年八月庚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1年，4251~4253页。
- ⑥（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八《宁夏镇》“保障考”，王友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15册（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324~325页。
- ⑦（明）刘敏宽《万历固原州志》上卷，牛达生、牛春生校勘《嘉靖万历固原州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114页。
- ⑧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盐池县古长城调查与试掘[J]，《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 ⑨ 王仁芳、明代修筑河东长城的新认识[J]，《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 ⑩（明）张雨《边政考》卷三，王友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14册（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128页。
- ⑪（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宁夏总镇续》，陈明猷校勘，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108页。
- ⑫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陕西七》，贺君次、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2803~2804页。
- ⑬《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宁夏总镇》，85页。

（责任编辑：赵 夏）